在小说家中，金庸是最有学问的

—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专访

□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
报人、读书人、商人

羊城晚报：盖棺论定，您怎么定位金庸？

陈平原：很多人把金庸当作武侠小说家来看待，这当然没错。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、有历史眼光的报人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在香港主持办《明报》，亲自写社论，社会影响极大。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很有政治智慧的，目光也很敏锐。其实，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能看得出来。他的小说对中国历史及现实有很强的观照，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某些重要节点上，屡屡可以见到金庸的影子。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、古龙的原因。

我不止一次提及，应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《明报》社论对照着读，那样会有很好的发现的。另外，他的媒体事业应该作一个专题来考察。新闻事业是他的立足点，不仅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借助报纸来记录乃至影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，这是理解金庸的重要角度。

在小说家中，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。他真的是一个“读书人”，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，拥有广博的知识，贯通古今与中外。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，有很难跨越的界限，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，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。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，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。

一个小说家能红火一段时间，很不容易；而一个小说家红火四五十年，那是个奇迹。无可讳言，金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。单纯的小说家走不到他这样的高度，比如，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，他的掌控、授权、宣传，体现了非同一般的商业眼光、能力和趣味。在商业化的时代，如何经营好自己，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本事。他了解信息时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，不时在重要关节点“制造”新闻，扩大小说的传播。一般来说，文人容易清高、空想，但金庸先生有足够的想象力写小说，也有足够的智慧掌控商业运作。

羊城晚报：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，金庸可不可以说是“百年一人”？

陈平原：在通俗文学里可以这么说，至于整个文学史，还有待论证。另外，这“百年一人”的说法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，不太好。

羊城晚报：不能和鲁迅、张爱玲等人用同一个标准？

陈平原：请记得，二十年前金庸的一个嘱托或抱怨：“我是一个小说家，不是一个武侠小说家。”我们必须正视他的这句话。说他是一个武侠小说家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他的小说成绩放低了一个档次？为什么鲁迅、茅盾等人写的小说，我们一般不会再加一个前缀？这涉及对现代中国小说的看法。金庸的“抗议”是值得注意的，他曾经说过：很多人是用中文写西洋小说，我是用中文写中国小说。他英文很好，读西洋小说，但某种意义上，他的笔墨、结构、审美，和传统中国小说联系更加密切。我们曾经认为章回体的写法是落伍的，出不了大作家；但现在看来，这种小说观念必须调整。先不要忙着下结论，而是从文学类型如何运作、读者趣味的形成、金庸小说的超越性等入手，逐渐逼近小说观念的调整。

2001年11月，陈平原（右）与金庸在日本横滨合影

接受武侠小说的“江湖规矩”

羊城晚报：金庸小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
陈平原：个人才华是一个方面，香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香港给金庸的写作提供了方便。香港的大众文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非常兴盛的，小说、电影、音乐是一个整体，有巨大的影响力。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，香港的商业土壤与文化基因促成了金庸的成功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大陆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出现“金庸热”？

陈平原：赶得早，不如赶得巧。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时，恰逢改革开放，过去僵硬的文学观开始调整，娱乐文化勃然兴起。而在各种小说类型中，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具有娱乐性的。在娱乐正当化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金庸的小说及影视。另外，那个时候的娱乐方式比较单调，放在今天，影响不可能那么大。金庸小说被接受的过程，本身也是一面时代变迁的镜子。

羊城晚报：武侠小说被人称为“成人童话”，有些部分的写作似乎有其不合常理处。金庸的小说主要是在报纸上连载的，据说有一次出差的时候，让古龙代写，古龙问有什么要求，金庸说：“不要把主要人物写死了就行。”您对此是怎么看的？

陈平原：小说在报纸上连载，因为赶时间，不能停，必定有这样的问题。但金庸小说在结集出版时，都做了认真修订，把太不合理的部分修正了。至于江湖、游侠、武功等，属于武侠小说的基本假设，不能动。不是所有小说都讲究“真实性”的，就像现代派小说里也有倾向于寓言或象征的。京剧表演有各种程式，不能用“写实”的眼光来审视，武侠小说也是这个样子。你必须接受这种程式，或者说“江湖规矩”，否则你读不下去。这与读者的阅读趣味有关，有人非常喜欢，有人深恶痛绝，但没有高低之分。

一个时代的结束

羊城晚报：对于金庸的去世，您感到突然吗？

陈平原：对于金庸的去世，大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。这些年，不时传来金庸病危的消息。五年前，电视台找我做专访，已经预录了关于金庸的访谈，估计很多媒体也提前做了资料准备。

两年前，香港举办“我与金庸”全球华文征文比赛，收到近万篇来稿，有商人，有官员，有教授，也有大学生、中学生。换句话说，武侠小说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读者至今仍有吸引力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与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也有关系。当然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去了解中国历史，但金庸的小说确实比其他类型小说隐含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，谈历史、说宗教、讲古琴、聊围棋，很少有小说能达到金庸小说的高度。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引诱后代学习中国文化时，往往让他们先从看金庸小说或影视开始的原因。

羊城晚报：金庸的去世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陈平原：金庸的去世，或许可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香港文化在大陆引领风骚，而作为其标志性人物的饶宗颐、金庸恰好都在今年去世，一学者一作家，一雅一俗，都是香港特别精彩的文化人。这两个人的去世，很让人叹惋。

『今番良晤，豪兴不浅，他日江湖相逢，再当杯酒言欢。咱们就此别过。』

说着袍袖一拂，携着小龙女之手，与神雕并肩下山。

——《神雕侠侣》

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

□施爱东[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]

金庸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，金庸小说的受众之广，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至中小学生，读者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多的。从他的武侠小说开始，通俗文学在文学史殿堂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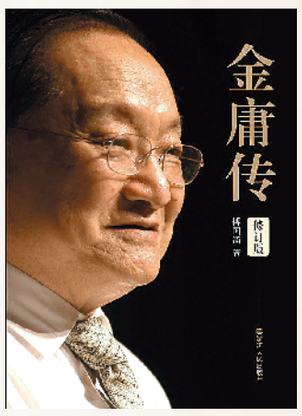
我认为，金庸的小说是“最中国”的小说。他用“英雄史诗”来写作武侠小说，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、民间文化的借鉴、深层人性的发掘，使之比其他武侠小说家高出一筹。也是因为金庸身兼文人、报人、商人多重身份，这让他知识面广博，对人性、世俗社会具有非凡的洞察力。金庸曾说过自己本来想当外交家，有着政治抱负。因此，他把人生理想融入小说，用小说讲出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构筑出自己的乌托邦。

金庸对自己的作品有不断修订、提升的意识。金庸的小说最早在报刊上连载，很多桥段人物设置并不完整，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过大量的修改，有些人物的名字都改掉了（比如王语嫣，原为王雨燕）。相比而言，古龙的小说就远没有金庸精致。他晚年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，我认为是改得好。很多修改的细节，更加符合人性。金庸对自己的小说，不断打磨，一再修改，说明他的心里想让自己的小说更加可以传世，不仅这一代喜欢，也想让未来的人也喜欢。

（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采访整理）

金庸已去，江湖何在？

□傅国涌[《金庸传》作者]



金庸走了，在阅尽沧桑之后，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，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，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，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。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年，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，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记载，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，他却是生于1923年。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，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、陶行知、汪兆铭等来观潮。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，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。九十五年后，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，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，就像他手创的《明报》也已与他无关。

他毕生的事业到底是《明报》，还是那些被千万人追读的武侠小说？这一刻也变得毫不重要，至少已与他无关。

十六年前，我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邀执笔写《金庸传》时，即已抱定平视金庸，而不是俯视金庸、更不是仰视金庸的态度，那时候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，在知识界却是毁誉参半。我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历史人物，站在中立者的视角来回望他的生平，当时他已八十多岁，虽未盖棺却也到了几乎可以论定时，我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一个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里挣扎过来的读书人。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少年查良镛，一个报业史上叱咤风云的查良镛，一个神坛下的金庸。凡知人论世，欲抱持平之论，古来皆难，非独今日。我特别希望能一分材料说一分话，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。如果仅仅将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家，我确实不是写《金庸传》的合适人选，但如果将金庸放在王韬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报业史的脉络里，放在百年言论史的传统中来看，我还是一个恰当的人选。

对于他那一代读书人，我又恰好有切身的体认，有许多的忘年之交，当时他们几乎都还健在。我将金庸放在这些人中间，即可看出在20世纪的相同历史背景中，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成长轨迹，接受过类似的教育，读过同样的书籍报刊，区别在于，他于1948年到了香港，并住下来了，不再走了。

即使晚年，西湖边的云松书舍也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。他毫无疑问是香港的产物，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，离开了这样的时空来看金庸，无论褒之贬之都没有历史感，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，钱穆先生是对的。

作为一代报人，《明报》的创办人，他的离世毫无疑问带走了文人论政的时代。自1981年我在雁荡山中第一次接触到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曾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，二十余年来，他的《明报》社评也曾一次次打动过我。十五年来，我的《金庸传》出过四个版本，我不断地逼近真实的查良镛，逼近他所处的时代，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患。

从一开始，他就是我心中的历史人物。早在他少年时代，在衢州石梁乡间写下的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《人比黄花瘦》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，他青年时在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，开始关注国际问题，《太平洋杂志》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、政论家的诞生。如果要问我对他的评价，差不多已尽在这二副不考虑平仄的挽联中了——

书剑恩仇，《明报》论政三十载；倚天屠龙，江湖笑傲十五部。

有独孤求败，无人敢言只手屠龙；无令狐少侠，有谁还唱笑傲江湖？

他诚然不像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的令狐冲，更不像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乔峰。有人说他是韦小宝，他说自己不是，我也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兼有郭靖的钝拙、韦小宝的精明和张无忌的犹豫，但他们同样都拥有大好的机遇，现实中的他在香港也是如此。他退出一手创办的《明报》，背后有多少心痛，无人能知，能窥见他真实内心世界的人真的不多，包括他的那些朋友倪匡、蔡澜和黄霑们。《明报》之后，他的江湖早也只剩下了武侠的江湖，曾经纵横的政论世界早已经消失。可以说，他创造了一个人的江湖，这里有水深浪阔，风波不息，也曾有侠骨柔情，剑胆琴心，哪怕如今只留下浑浑噩噩、苟苟且且。

他和郭靖、张无忌一样生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乱世，他和他们一样有刻骨铭心的孤儿情结，他也是动荡岁月中丧母丧父的孤儿。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，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尽的。在失去了金庸之后的江湖，仍然还是那个江湖吗？

改小说与读博士

——金庸晚年采访片断

□李怀宇[《访问历史》作者]

作为“金迷”，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，便说：“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，张兆和就跟他说：你不要再改了，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。”金庸说：“小说是自己的作品，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，需要修改一下。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，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。鲁迅也讲，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，不要发表，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，觉得不好，再修改一下，又觉得好一点，还是放在那里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，再改一下会好一点。”

我说：“您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，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，还有第二次，还有第三次，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。”金庸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，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。托尔斯泰写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，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，他太太就重抄一遍，抄好了放在那里。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，当然好得多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，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，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。所以自己写的文章，一定可以改的。”

我随即说：“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，还要那么改？”金庸说：“不敢当！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，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，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。普通作家写了以后，叫他修改一个字，他也不肯修改的，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。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，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。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，给了印刷厂，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，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。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，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，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。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，比较用心的。”

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，便问：“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、电视的吧？”金庸说：“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。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，他们说：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，自己写一个好了。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。”

我又问：“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？”金庸说：“我跟他说：你改了，我不承认。他拍的，我有些看，有些不看。有些拍不好，我就不看，我跟他说：你有些拍得不好。”我笑道：“我觉得《天龙八部》拍得比较好。”金庸也笑道：“《天龙八部》没有什么改动的。以前我说：你不要改了，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。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。”

我说：“其实您在创办《明报》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，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、电视的写法。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，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？”金庸一听，不禁微笑：“对，西方电影、电视我都看。当时在香港写影评，就每天看一部电影，香港放电影很多，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。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……”

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，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。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八十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。金庸说：“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，排名在一般教授、院士之上，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，他们说：不用念了，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。我说：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。后来校长就同意了。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，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，就不要写了。”

金庸想了几个问题，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。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，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，再打皇宫。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，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？直接过去就可以。金庸说：“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，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，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。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，李世民在这里埋伏，从半路杀出来，把他们打死了。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，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太名誉。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，也不但是唐朝，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，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。”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：《初唐皇位继承制度》(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)。得了很高的分数。

接着，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，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，后来荣王死掉了，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，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。金庸说：“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，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，把两个大将杀掉了。我找了很多证据，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，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，把弟弟杀掉了，而且他占有军队，连父亲也不敢动他。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，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，哪个会打仗，就传给哪个。中国古代是不讲宪法，只讲兵权，外国也讲兵权，但是外国表面上做得漂亮一点。”

金庸的老师麦大维（David McMullen）早已到了退休年龄，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，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。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：“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，我们最喜欢。”

我问：“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，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？”金庸说：“我到剑桥，目的不是拿学位。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。”

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，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，时年八十六岁。

制图/李焕菲